

復員建國的 急務

周佐治著



復員建國的急務



青年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一——五〇〇〇）

復員建國的急務

定價國幣六〇〇元

著

者

周

佐

治

發

行

者

青

年

出

版

社

版權所有

印

刷

者

中

央

青

年

印

刷

所

南京中正路顯後街十二號

復員建國的急務

目次

一、抗戰，復員，建國·····	一
二、軍隊國家化·····	二〇
三、政治民主化·····	三四
四、經濟的安定與新生·····	五二
五、交通的維護與發展·····	七二
六、教育的改進與普及·····	八五
七、衛生的革新與擴展·····	九六

復員建國的急務 目次

八、結語

.....

一〇四

二

復員建國的急務

周仕治著

一 抗戰，復員，建國

八年來的抗戰不啻給新生的中華民族一次偉大的空前的血的洗禮與火的陶鑄，好像歐洲傳說中「再生的鳳凰」，經過了血的洗鍊，火的煎熬，反能夠孵育出茁壯的雛翼，向着理想的，遼遠的碧海蒼空自由的翱翔。因此，這一次的抗戰在綿延亘長的五千年歷史當中應該雄踞着最光榮的寶座，而成爲劃時代的指標；不僅如此，它在四億五千萬同胞的心靈深處烙印下不可磨滅的疤痕，使他們體認到勝利的成果，並非倖致。

固然，我們不是戰爭的謳歌者，說什麼「戰爭乃一切之父」；但，無可否認地戰爭確是革命的插曲，或者更可以說，戰爭與革命是一事的兩面，造因與結果都是互有關連。誠如黑里偉（E. Haery）在世界危機（The World Crisis, 1914-18）一書中所說：

「世界上歷來一切重大變亂，戰爭與革命二者，往往是同時兼備的，尤以現代歐洲爲然。」

這是他開始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最醒目的說明。其實，何僅歐洲如此，世界各地莫不皆然。因爲在現實的世界中，如果孕育着革命的種子，那就難免不爆裂成爲戰爭；而戰爭的結果又往往促成革命的成功。所以，戰爭乃是革命過程中的一部份，它不能孤立於革命的範疇以外。就本國最近百年的史乘來說，由於清廷的專制腐敗，招致帝國主義者的覬覦，豆剖瓜分的危機潛然四伏，民族革命的思潮乘時而生，與帝國主義的利益針鋒相對，如水火之不能相容。從而一方面是革命浪潮的掀天動地，另一面是帝國主義的橫加阻撓。爲着民族的生存，爲着革命的成功，戰爭遂成爲必經的歷程。試看甲午（一八九四年）一役之後，清廷的喪師辱國已達到不能忍受的最高峯，帝國主義窮凶極惡的面目全部暴露無餘。於是趨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口號，由宣傳而見諸行動，由行動而見諸事實。可是，新中華民國的誕生，假若是真正的民族復興的前奏，那對於以東

亞霸主自命，以鯨吞蠶食中國爲目標的日本，無疑地是絕大的阻礙。因此，辛亥革命的完成，就是對日戰爭的開端。蔣主席在二十九年國慶紀念日就剴切的昭示：

「自辛亥至今，中國建國事業之所以如此遲鈍延遲沒有繼辛亥而完成者，其最大癥結就是因爲有日本軍閥這一重大的障礙。」

由於強盛統一的中國是日本軍閥遂其侵略野心的障礙，而積極侵略的日本軍閥是中國完成建國事業的障礙，從而一部民國史可以說純粹是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史，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革命奮鬥與日本侵略野心的對照史。當民國成立伊始，日本就以五路建設權作爲承認的條件，接着又發動借款作爲袁世凱鎮壓革命的本錢，漸減了第二次革命的勃興和發展。迨歐戰爆發，日本悍然出兵山東，並提出二十一件作爲扶持袁氏帝制成功的交換條件。袁氏既死，又以西原借款製造中國的內亂。馴致干戈連年，國家元氣大形斲喪。爲着國家統一，拯生民於水火，國民政府誓師北伐，日本便露骨的演出濟南事件，不惜的以武力作阻撓。但革命的浪潮不是任何的堤防所能範圍和阻塞的，在艱辛萬難

的局面下，北伐終究完成。北伐的完成不啻是革命勢力洶湧澎湃的表現，而革命勢力的增長是與帝國主義的利益相盪相決極不相容的。九一八，一二八就是這種衝突的序幕，七七盧溝橋事變就是中華民族求獨立和生存與日本帝國主義用暴力征服兩大力量對峙的展開。

追蹤索跡我們可以說這一次的抗戰是國民黨繼承辛亥革命的餘緒，北伐統一的精神來完成的偉大民族獨立的工作。換句話說，抗戰是國民革命過程中的一部份，也是我們革命造其因，也是我們革命結其果，這亦即是說抗戰的勝利是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必然的收穫。

戰爭與革命既不可分，而戰爭的成果亦惟有在革命的前進中來葆愛，來發揚，要這樣才能消滅戰爭的導因，才能保持世界的和平。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煙火漫天的情況中結束時，人們警惕於戰爭的殘酷，無不希望保持永久的和平，以免人類再蹈一次大戰的覆轍。可是，由於戰勝國不能認識一個世界戰爭的革命性質，以及激動這個戰爭的革命

所具有的特性，只知道一味的奢戀過去，馳神於戰爭未誕生前的繁榮，將潛滋暗長的革命潮流漠視勿睹，結果鑄成第二次大戰的惡果。和平之條件（Conditions of Peace）的作者卡爾（E.H. Carr）說過：

「一九一九年和議之無當，是由於那般締造和議的人們未能認識當代的革命。從過去回顧中，我們不難了解，資本主義競爭下日趨緊張的局勢，乃是造成一九一四年人類浩劫一個最大基本的原因。從上次大戰到這次大戰，人們一直爲一種矛盾所迷惘，那就是協約國「贏了勝利」，卻「輸了和平」。在那二十年當中，兩個在一九一八年一敗塗地的大國，在復興工作上有了驚人的進展，且進而執掌歐洲政治的牛耳。至於一九一八的戰勝國呢，則呆立一旁，無可奈何，此中原因，不止一端；美國與和議的牴牾，協約國彼此的爭權奪利，希特勒的狂暴作風，英國的解除武裝與因循姑息，凡爾賽條約的過分苛酷不足……種種說辭，不一而足，所有這些全是皮相之論，未曾窺見事實真相。蓋戰勝國家所以輸却和平，

而蘇聯，德國所以贏得和平之故，乃因前者一味墨守，有時甚且奉行那早已過時的國家權利與經濟放任主義的理想，而後者輒能認清二十世紀的革命潮流，於有意無意之間循之前進，企圖以集中計劃與統制的方式，建立單位較大的世界。固然，集中計劃爲統制的方式，並不是極理想的贏得和平永平的辦法，不過在歐洲大戰後的荏苒韶光中，各戰勝國家咀嚼着勝利的殘果，回顧着過去的光榮，聽任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日趨於懦弱無能，資本主義的放任自由更趨極端，釀成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的交織，自身補苴之無暇，遑能顧及於其他。於是德意日等用強權統制的國家，遂能整軍經武傾洩其瘋狂的侵略慾，第二次人類的悲劇不能不一幕一幕的揭開。

中國是第二次人類浩劫中最先受侵略和犧牲最慘重的國家，可是在近二十年當中，她是能夠迎合新的革命潮流，高瞻遠矚，以新的民族，政治，經濟的觀念來建築新的社會的前進者。由於這種前進的思想會招致強盛的中國之出現，以及進而可以成爲維護世界和平的柱石。因此，近居東鄰，虎視眈眈，一心以讀武主義來侵略東亞，征服世界的

日本帝國主義遂先伸其魔掌給予無情的壓迫，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推殘中國工業，破壞中國統一的行為上莫不盡其心叵測的能事。中國的建國大業終至於淹遲歲月，不能積極的完成，導因在此。但是一種能夠內合國情外應世界潮流的革命思想，只要經宣傳而深植於人心，這就是莫大的力量，好比是大地之下的暗泉一樣，牠本身具有澎湃衝射的威力，只要有罅隙牠就會噴射而出，使大地立成爲水晶的世界。日本帝國主義默察這種力量的不可侮，乃訴諸於武力征服的最後手段，想將這種前進的革命思想根除株滅，將中國淪爲永久的附庸。然而當時的西方諸國不能體認中國國民革命前途的偉大，不能理會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真理所在，互相還在勾心鬥角追逐舊式國家權利的把持，合作既不可能，制裁干涉復成爲夢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造因，於茲發軔。

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也自然不會有將來。國民黨五十年奮鬥的經歷，以及最近八年來領導抗戰的慘痛經驗，這就是我們的過去。怎樣珍視勝利的成果，怎樣在世界潮流中來完以復員建國的工作，這就是現在。由中國的強大成爲遠東和平的柱石進而促進

「世界的永久和平，這就是將來。如何把握現在以期實現將來，便要以復員建國工作的成績來當作攷驗的試金石。」

記得有一個英國作家說過，動員的效果要由復員的結果來衡量，這就是說復員的工作比動員工作來得更為繁難，因為當戰爭開始的時候，人們的感情由於愛國心的驅使，而達到激動的最高潮，無論軍事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方面都容易達到為戰爭而動員的預期成效。同時假使戰爭是有光榮和正義的責任，使人人都懷有必死的決心來担負，來完成，那麼動員的效果更會在社會各方面表現良好的反映。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論到「國家與民族的強盛」時，對於有偉大目的的戰爭曾寄予莫大的讚美，他說：

「沒有人能不運動而獲得健康，而政治的個體亦與自然的人體相同，所以一次適當而光榮的戰爭正可稱之為一國或一族的良好運動。內戰的發生，固然是如患熱病者的發熱一般有害於健康；但是對外的戰爭，却猶如運動時所發生的體熱，能加強

體力。因爲在一個安嫻的和平生活中，人民的勇氣會趨於消沉而社會的習俗也將日形腐化。L

運動可以增加體力，但運動後的疲勞，却正和戰爭結束後人們心情的鬆懈和放弛一樣，有着一種自然的阻力。復員的困難就往往由於這種阻力的作祟使復員不能達到理想的程度。

前面說過戰爭是革命的插曲，兩者有着不可分離的關連，但革命的進展，由於新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不斷的變動，不停的前進，它的任務是連續的，綿延的，尤其是要根絕下一次戰爭的再度來臨，革命的本質就要伴隨着時代的趨向而有所適應。因此，我們可以說，戰爭的任務有時而終，但革命的任務則無時或已，人類社會要想達到和平，康樂的理想境界，必須遵從這不可越犯的準則。由於此一論點的推演，我們對於作爲戰時渡到平時不可少的復員工作，負有怎樣嶄新的意義和如何艱鉅的任務，不難想像得到。其實，不管復員工作何等作法，但在大戰之後，所有從前舊的社會秩序必非本來

面目，也決非本來面目；因為戰爭的破壞，使沒落的舊社會形態不能立足，同時由於戰爭的激盪，無形中發育了新的需要和期望，為未來的社會決定了政治的經濟的形態。有人說過：「社會形態是戰爭經驗的反映，又是戰時動員與平時重建的協調」，這的確是中肯之論。就我國抗戰以前的情況來說，由於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軍閥和封建殘餘的作祟，將一個國家淪落成次殖民地的形態，說不到軍政的統一，說不到自由的經濟建設，說不到民族精神的培護和發揚。一切的一切都只在外鑠與內在的兩重桎梏之下表現凌亂，依賴，灰頹的氣息。可是蘆溝橋的炮聲衝破了舊有的沒落的壁壘，揚棄了一切落後的腐敗的渣滓，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中就說過：

「自七七以後，全國上下在不變的國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會的風習，政治的氣象，莫不丕然煥發。……民族精神，隨抗戰的發展而磨厲。民族意識，受抗戰的洗鍊而純一，因此而軍政的整飭，軍令的統一，有空前的進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規畫，亦能漸收運用靈敏的實效，且因此而生產的計劃化，企

業的社會化，亦有長足的進步，將來民生主義的經濟基礎實樹立於今日抗戰時期的建設之中。L

這就是說明戰爭摧毀了舊的意識和形態，而新的意識和形態則在戰爭的過程中萌芽和生長起來，怎樣維護這戰爭賜予的新生命而使其發揚光大，這就是復員工作的責任，所以我們的復員決不是復原，而是具有革命性，創造性的復員。

可是，戰爭究竟是破壞性的行動，爲世界正義而戰，爲自己民族的獨立生存而戰，固然可以收穫到前段所說的精神效果，但在物質方面仍不免有重大的損失，一種不是短期間所能恢復的損失。尤其是被侵略的我國，是在國內作戰，敵人的鐵蹄踐踏了大半的河山，幾千萬的人民顛沛流離，無家可歸，幾多重要的資源，若干重要的工業，以及許多繁榮的農村，都遭受受到佔據，劫掠，破壞的厄運。如何從戰火的廢墟上重新來作市鄉的經濟社會事業的建設？怎樣使流亡的民衆與解甲的官兵有家可歸，有業可作？這都是復員工作中的主要目標，所以我們的復員仍是動員，決不是由動而靜的消極的復員，乃

是積極性的建設的復員。

我們的復員特性既如上述，那麼所謂革命性，創造性，以及建設性等就應具有一個共同的標的，作為工作的規範，這個共同的標的是什麼？就是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五十年來國民黨艱貞的奮鬥，億萬民衆共同發出的心聲，皆是在企求這一個歷史使命的完成。因此，復員工作與建設工作應該是合拍的，調協的，甚至可以說復員與建國應該是合而為一的。復員工作的開始就是建國工作的開始；復員工作的完成就是建國工作基礎的完成。

說到建國的工作好像經緯萬端，不知從何着手，但我們只要檢視一下現代國家建國的歷程，定能抽繹出可以覆按的軌跡來。

第一是統一的民族國家，在歐洲，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十字軍運動開始，就發生了民族內移現象，凡是血統，語言，文化相同的民族開始意識到組織一個統一的政治單位之必要，到了拿破崙雄霸歐洲，此征彼伐，就以協助各被迫民族恢復自由相號召，